

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

邹兆辰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摘要] 改革开放对历史学科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产生了独立的史学理论学科,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史学理论学科。40年来,史学理论学科在学科建设、学术体系建设、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史学理论对整个历史学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在总结40年史学理论学科成绩的时候,也需要对学科发展中深层次的问题进行反思,以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改革开放 40年 史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332(2018) 03-0001-10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史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当今,史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就反映着整个中国史学发展的态势;史学理论学科中存在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整个史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改革开放40年的今天,反思一下史学理论发展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对促进史学理论学科的健康发展应该说是需要的。

一、改革开放与史学理论学科的产生

改革开放对于中国历史学来说,其中一个重大的影响就是史学理论学科的产生。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前虽然一直存在着对于史学理论诸多问题的研讨,但不存在一个史学理论学科。

史学理论学科的产生,是改革开放以后史学发展的产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史学工作者打破“左”的精神枷锁,一系列史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为发展新时期中国史学做出了重大贡献。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明确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立即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包括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并做出了定期召开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1984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专门指示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世界史研究所都要成立史学理论研究室,而且强调,世界历史所的史学理论研究室主要是研究外国的史学理论。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筹备并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1987年,第一份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1992年《史学理论研究》创刊。与此同时,各地高校也在根据自己的条件,开设史学概论课,第一批史学概论课的教材也开始问世,这样就产生了一批从事史学理论教学与研究的

[收稿日期] 2018-07-28

[作者简介] 邹兆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双一流”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开始招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有的高校还成立了史学研究所,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教学、科研和研究生培养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90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下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开始把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列为历史学下的第一个二级学科。这意味着经过多年的发展实践,史学理论这门改革开放前不曾存在的学科,已经正式获得了学术界的承认。

回顾史学理论近40年的发展历史,我们不能不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对史学理论学科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史学理论》在创刊时的《发刊词》写道“我们的时代是改革的时代,开放的时代。改革和开放,是我们时代的最突出的特征,最重要的要求,最强大的潮流”,“改革的时代,必然是创新的时代,探索、开拓、创新,便是我们的时代精神”,“要改革,必然要开放。要开放,就要‘引进’,要吸收和借鉴国外一切有用的东西。”^①今天,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感谢最初一批高举思想解放的旗帜,冲出长期以来遏制史学理论发展的种种“左”的思想桎梏的那批学者,感谢最早把国外史学发展新思想、新方法、新动态介绍给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思想界、学术界的学者,他们给渴望了解国外学术状况的青年们,送来了一股清澈的甘泉。这种时代潮流的涌动,使每一个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回想起来都会感到激动不已。

史学理论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需要区分一些当时人们还认识不太清楚的概念,如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学术界对于史学理论是否有自己的研究对象,能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认识上还是不清楚的。

1984年,宁可《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的文章,受到史学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他主张区分一般的历史科学理论和严格的历史科学理论,而严格的历史科学理论就是探讨历史学本身的理论问题。他把当时史学理论方面涉及的内容概括为六大方面:一是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或规律的探讨;二是关于客观历史发展的辩证法问题;三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或规律在特定时代、地区、民族和社会现象领域的具体化;四是历史学本身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如历史学的对象、任务、特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历史认识的特点、历史学的层次与结构、历史学的方法等;五是史学史和当代各种史学思潮、流派、观点的研究和评论;六是对当前历史研究倾向的研究与评论。他指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历史科学理论应该有自己专门的概念、范畴、原理和规律,并且构成一个严整的科学体系,那么只有上述六个方面的第四个方面也就是只有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才属于历史科学理论的研究对象。^②

1986年12月,陈启能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强调区分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两个概念。认为从狭义上说,史学理论是指历史学本身和与其有关的各种问题的研究,包括同历史学有关的理论问题,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史学新领域和新流派、跨学科和跨文化史研究、历史写作理论,等等;而历史理论则是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研究,包括各种相关的理论方法论问题。^③瞿林东在《史学理论》创刊号的圆桌会议上指出:我们“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具有的总的指导意义,但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能代替史学理论;因此,史学工作要有更大的发展,必须建立起本学科的理论体系。”^④

区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两个概念,对于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有重要的意义。它是把发展历

① 《时代·历史·理论——代发刊词》,《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② 宁可《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一》,《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③ 陈启能《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光明日报》1986年12月3日。

④ 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史科学需要研究的各种理论、方法论问题进行一个相对的分:一个是以研究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一个是研究历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但这种区分,并不意味着史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和,可以脱离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指导。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两者往往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史学理论学科的发展

(一) 史学理论学科的基础建设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受到空前重视,各个高校恢复了史学概论的课程,史学概论的教材建设也提上日程。

1978年,教育部委托山东大学历史系和云南大学历史系共同编写《历史科学概论》教材,由葛懋春担任主编。1983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最早的一部史学概论教材。20世纪80年代初,白寿彝先生就感到有开设史学概论课程的必要,1981年他就提出了编写提纲,组织青年教师进行讨论并分工撰写,1983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后十余年,出现了一个史学概论教材编写的热潮,各种不同体系和风格的史学概论著作纷纷问世,吴泽、宁可、庞卓恒、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李振宏等学者都参与了史学概论教材的编写,有的教材还经过多次修订再版。有的高校历史系史学概论课教师编写、出版了本系适用的教材,史学概论教材出现多样化的局面。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史学概论教材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教材《史学概论》出版于2009年,它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多次史学概论编写的经验,由这个领域的著名专家编写,形成新时期史学概论教材中影响最大的一部。

新时期以来编写的各种史学概论教材的体系、内容、风格和适用对象不尽一致,但是这些教材的编写,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理论学科受到高度重视的现实,为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奠定了基础。通过史学概论课程的讲授,对历史系学生进行有关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教育,对于提高大学生的史学理论素养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史学概论教材编写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为进一步开展相关的学术研究创造了条件。史学概论课的教师,成为进行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力量。但是,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本身涉及的内容很多,通过一本教材和一门课程来解决历史专业大学生的史学理论素养的问题还是有困难的,需要从不同的途径来解决。

(二) 史学理论学术研讨的平台

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是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平台。1984年11月在武汉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从此开启了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的传统,受到全国史学理论界学者的高度重视。这个研讨会,先后就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历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全球化与全球史、中国世界史研究体系建设、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新世纪唯物史观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以及建国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和《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一直是这个讨论的主要主办者。2017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第20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主题是“当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前沿问题”。2018年10月,将在上海召开第21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主题是“传统史学与现当代史学”。从第一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召开至今34年来,全国史学理论研讨的持续举行,表明新时期史学理论研讨的热潮还在持续,新一代的史学理论研究的队伍正在成长。

《史学理论研究》是史学理论工作者经常性的学术研讨平台。1987年创刊的《史学理论》是它的前身。1992年正式创刊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许多前辈学者在这里发表了高水平的学术成果,许多史学理论的学术新秀,也是在这里开始进入史学理论的学术园地。2017年第2期的《史学理论研究》发表了纪念杂志创刊30周年专栏。专栏“编者按”指出“30年来,杂志坚持为改革开放这

一伟大时代主题服务,自觉坚守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展示当代中国历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研究的优秀作品,并引入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成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推动着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新形态的构建。”这一评价,应该是符合实际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从 2013 年起陆续举办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从历届论坛的情况看,与会学者们就新时代条件下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如何与历史研究实际结合、唯物史观与历史学各分支学科建设和理论构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新形态的评析等问题展开讨论。论坛受到各科研院所和高校学者的重视,对促进新时期史学理论研究起了积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室创办的《理论与史学》,以书代刊,每年一辑,自 2015 年创刊以来已经出版 3 辑。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高水平的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研究成果,期望成为史学理论工作者“发表心得和进行交流的平台”。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成立于 2000 年,是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心自成立以来,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国际性或全国性的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学术研讨会,联系了众多海内外研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学者,推动了史学理论问题的研讨。中心主办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自 2002 年起创刊。该刊以书代刊,每年一册,发表该领域的重要学术成果。当时的中心主任瞿林东在创刊号的“卷首语”中指出:“‘学刊’是反映史学界同仁在史学理论、史学史研究领域之最新进展的一个学术园地。其宗旨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继承优秀史学遗产,促进中外史学交流,切磋学术,开拓创新,推动史学理论、史学史研究的不断进步。”十几年来,《学刊》确实起到了这一作用,为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园地。此外,自 1981 年正式创刊的《史学史研究》,虽然侧重于中外史学史的研究,但进行史学理论的研究,也是该刊的重要办刊宗旨之一,也为史学理论的研究提供了阵地。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除了固定的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的活动,《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等学术交流平台以外,全国各高校也陆续组织了一些不定期的史学理论方面的学术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对于扩大史学理论学科的影响、扩大史学理论学者队伍、深化史学理论问题研究起了很大作用。如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高校都组织过这样的研讨会。也有一些地方高校学报开设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栏目,如《首都师范大学学报》、《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等。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刊复印资料《历史学》虽然不属于一线平台,但它广泛转载各地报刊的史学理论研究成果,是高水平史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展示,对于促进这些成果的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三) 高层次史学理论人才的培养

史学理论学科与史学史学科的发展,有赖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陆续招收了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具备条件的各高校如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开始招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专业的博士生。近 20 年来,许多具有博士学位的史学人才不断充实到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学术研究的队伍中来。据统计,从上世纪 90 年代到 2017 年,仅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的导师们就培养了该专业的博士 120 余位,他们的论文选题方向侧重于中国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以史学史的方向居多。复旦大学历史系则成为培养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专门人才的学术重地,他们培养的西方史学史专业人才不仅承担了重要的学术研究任务并且充实了各高校西方史学史的教学、科研人才队伍。此后,其他高校也陆续培养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的博士生。

今天,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已经成为培养史学人才的重要学科,早期毕业的博士生来到专业岗位后,已经培养出各自的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专业的博士生。史学理论专业的人才培养,已经形成

了良性发展的局面。

(四) 学科体系的新发展

2017 以前,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是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在学术研究和研究生培养上,有的侧重中国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有的侧重于外国史学理论和史学史。2017 年新的学科目录公布,中国史和世界史形成了两个独立的一级学科,各自都有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二级学科,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世界史学理论和史学史这样两个并立的学科,从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上无疑是一个新的发展。从此,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的发展,将会在更广阔的领域和更深入的程度上发展。

三、史学理论学术体系建设发展大势

历史学是哲学社会科学中“具有支撑作用”的一门重要学科,而史学理论学科是历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史学理论的发展是整个历史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史学理论学科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对于整个历史学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40 年来,史学理论学科的学术体系建设,是通过教材编写、学术讨论、论著发表、人才培养、对外学术交流等各种途径逐步建设起来。这个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长时间的学术研讨中形成的初步具有中国特点的史学理论学术体系。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学者们就在思考如何建立史学理论的学术体系。

庞卓恒在 1988 年第 1 期的《历史研究》上发表文章,认为历史学的理论体系主要是由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三个部分组成。他的观点受到史学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并对当时的史学理论教材编写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教材,都是以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为基本框架来阐述史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宁可在《史学理论研讨讲义》中,则把史学理论的体系,分为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价值论、史学方法论、历史学的任务和史学工作者的素养几个方面。

(一) 历史认识理论的探讨

在史学理论学术体系的建设上,最早开始的是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从 1987 年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上开展了关于历史认识论的讨论以后,形成了一个历史认识论研究的热潮。学术界先后发表了刘泽华、张国刚的《历史认识论纲》(《文史哲》1986 年第 5 期)、陈启能的《加强历史认识问题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 年第 11 期)、翁飞的《历史认识的一般模式及主要特征》(《社会科学研究》1987 年第 6 期)、赵轶峰的《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研究》1988 年第 1 期)、李振宏的《论史家主体意识》(《历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和《论历史认识中的客体范畴》(《史学月刊》1988 年第 4 期)、刘爽的《历史认识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学习与探索》1988 年第 6 期)等。

学术界关于历史认识问题的讨论也在教材的编写中反映出来,如李振宏的《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宁可、汪征鲁主编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庞卓恒的《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姜义华、赵吉惠、瞿林东的《史学导论》(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等。李振宏《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认识论研究》(《史学月刊》2008 年第 7 期)的文章和周祥森《反映与建构——历史认识论问题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一书全面反映了这场历史认识论问题讨论的情形。袁吉富的《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于沛的《历史认识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林璧属的《历史认识的科学性》(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则是有关历史认识论问题的学术专著。

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是学者们受到了哲学认识论的启发,同时也受到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结合中国史学实际形成的有中国特点的史学理论学术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几十年来,历史认识论问

题的讨论涉及到历史认识的主体、历史认识的客体、历史认识运动的形式、历史认识的本质属性、历史认识的特点、历史认识的检验等问题,可以说初步形成了历史认识论的学术体系。

(二) 史学方法论的探讨

史学方法论是史学理论学术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近 40 年来学者们对这方面的探讨持续不断。新时期以来所编著的史学概论教材,无论其体系有何不同,都不能没有史学方法论的内容,而且都希望能够有更新、更全、更能为年轻的史学工作者把握的史学方法论。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学术界出现一个探讨史学方法论的高潮。1986 年的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就是以史学方法论的建设为主题的,学者们围绕方法论的问题各抒己见,1987 年出版了《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当时,学者们对史学方法问题的探讨十分积极,类似的著作还有彭卫、孟庆顺的《历史学的视野——当代史学方法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赵吉惠的《史学方法论》(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赵光贤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8 年版)、李振宏的《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等。庞卓恒的《比较史学》(中国文化书院 1987 年版)、范达人、易孟醇的《比较史学》(湖南出版社 1991 年版)等 20 世纪 80-90 年代出版的各种史学概论教材,都有相当部分的史学方法论的内容。此外,引进国外史学方法论的著作有项观奇编《历史比较研究法译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波兰学者托波尔斯基著的《历史学方法论》(华夏出版社 1990 年版)也在 1990 年翻译出版。

这些史学方法论著作编著的目的在于,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批判地继承与吸收中国传统史学方法,借鉴西方史学新方法的基础上,试图提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方法论的新体系。

回顾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关史学方法论的学术探讨,可以看出这样一种趋势:

第一、集中关注西方史学方法的介绍、分析。由于中国史学长期以来与外界隔绝,中国学者对国外的史学方法一无所知,当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到来时,大家自然把目光转向域外的新史学方法。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经出现过史学研究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探讨,系统论的方法、计量的方法也曾经引起过很大关注。此外,比较史学、心理史学、计量史学、口述史学、跨学科研究的方法,都曾被认为是新史学方法,被引入各种史学概论教材的编写。

第二、关注中国传统史学的治学方法,关注民国时期史家的治学方法。对西方新史学方法的关注也引起一些学者的思考。原来,这些西方史学方法都有它的适用范围,有它的局限,这些方法不能普遍地运用于中国的史学问题研究,因此大家回过头来,更多地关注中国学者曾经应用的方法,所以对乾嘉学派的治史方法以及王国维、梁启超、胡适、傅斯年、陈寅恪、钱穆等学者的治学方法研究成为一个时期新的热潮。仅对乾嘉学派史学方法的研究,就有漆永祥的《乾嘉考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罗炳良的《清代乾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陈祖武、朱彤窗的《乾嘉学派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等。

第三、对于史学方法问题的深入研究。学术界在国外新史学方法的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学者自己的实践推出了新的学术著作。如赵世瑜总结了区域社会史的研究理念和方法的《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三联书店 2006 年版)、周国新主编的《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陈新的《西方历史叙述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李剑鸣的《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包茂红的《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杜君立的《历史的细节:马镫、轮子和机器如何重构中国和世界》(上海三联书店 2013 年版)等。此外,台湾学者王尔敏的《史学方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杜维运的《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也在这时期出版,丰富了学者对史学方法论的了解。

第四、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史学理论界对于史学方法的探讨经过很长时期的摸索,

经过一定的反思, 感觉到这些年来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认识存在一定的误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坚持用唯物史观来指导史学研究的, 但并不排斥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 同时也注意吸收国外有益的史学研究方法。要辩证地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 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析方法、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分析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历史人物的分析方法、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的分析方法都是有广泛的适用性的。新世纪以来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著作, 都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运用, 如瞿林东等著的《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就设专章来分析“唯物史观指导下史学方法的进步”问题。

(三) 史学评价理论的建立

从中国史学史的角度看, 史学评论对于史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唐代刘知幾的《史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 包括的范围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没有史学评论也就产生不了史学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 许多学者非常强调史学评论的重要性。瞿林东认为, 史学评论是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因之一。“从一定的意义上说, 司马迁对《春秋》的评论, 班固对《史记》的评论, 范曄对《汉书》的评论, 正是他们得以创造出新的历史著作的内在驱动力之一。而他们的评论和他们的杰作, 又激发着后来的史学家们的思考、评论和创造, 推动着史学的发展和进步。”^①瞿林东从20世纪80年代起, 就撰写了《谈史学评论》、《略说中国古代的史学评论》、《史学评论与史学工作者的自我意识》等文章, 倡导开展史学评论。1991年起, 他在《文史知识》上撰写《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的系列文章, 到1994年结集成书, 由中华书局出版。2016年, 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增订本)》。他曾强调,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 并不全是表现在史学批评中, 但是往往是在史学批评中实现的。

改革开放以来, 史学理论界对于历史评价问题发表了大量的论著, 如何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历史评价的理论是一个新课题。邓京力的专著《历史评价的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就是在总结建国以来前辈学者在历史评价论研究方面点滴成果的基础上, 从哲学领域中引进了价值论的理论和方法, 将之与历史学研究的实践结合起来, 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历史价值论的新理念, 初步构建了一个历史评价论的理论体系。她通过探讨历史评价的认识功能、历史评价的本质、过程与特征、历史评价标准、影响历史评价的若干因素、历史评价的检验、历史评价的科学化等问题, 由此构建出历史评价论的一个理论体系。孙麾、吴小明主编的《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哲学与史学的对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 从哲学与史学关系角度探讨了历史评价问题。

历史人物评价的研究是历史评价研究的重要方面。20世纪以来的史学发展中, 历史人物的研究是一个重要方面, 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问题自然也受到史学工作者的重视。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人物研究与评价是个热门话题, 参与讨论的学者多, 研究的人物和问题多, 论辩的水平高。20世纪80年代前期, 社会上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促使了历史人物评价的高潮, 而90年代中后期则出现了对历史人物研究的新的研究的高潮, 主要涉及人物研究的价值论、方法论和对于一些具体人物的研究。方敏、宋卫忠、邓京力著的《中国历史人物研究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 反映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

(四) 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探讨

近年来, 关于中国史学的话语体系问题也引起史学理论界学者的注意。

瞿林东于201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文章指出: 学术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学术面貌及其走向, 而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既有内在的历史联系与新的创造, 又有内在

^① 瞿林东《史学与史学评论·自序》,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和外在的沟通与借鉴。他认为:学术话语体系,离不开学术思想、研究理念与方法、范畴或概念的运用、关于研究对象的解释以及语言表述的风格和特点等。因此,所谓话语体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际操作和运用的问题。瞿林东认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则应加强对中国史学遗产的研究,发掘和梳理其中有价值、有意义的成果,并加以继承和发扬,作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当代建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应当强调的是,这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这是建设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际基础,也是显示历史学的中国特点、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重要路径。^①

乔治忠认为:所谓“话语”,实际是人为为申述思想、见解之概念和范畴所构成的体系,不同的话语体系,会导致不同的理念。中国史学在长足的发展中,形成了丰富的概念组合,如表达史家必备资质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等概念,反映史籍存在官修、私修以及不同级别的国史、野史、正史、杂史等概念,说明史学社会功能的鉴戒、资治、经世等概念,彰显治史准则的直书、实录、实事求是等概念,归纳史书编纂方式和内容范围的体例、书法、通史、断代史等概念,揭示史学内在结构和层次的“事”、“义”、“文”概念等等,不胜枚举。这些概念经过整合与新的阐释之后,大多能融会到当代史学理论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②

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建设已经开始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但中国史学理论的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和学术体系的建设结合起来,通过史学理论方面教材的编著、专著的编纂、论文的撰写、学术讨论的开展等途径来进行。特别是导师们在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学术论文的撰写中,应注重培养年青一代学者探索运用中国话语来论述史学理论问题的能力,这样以中国话语发展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目的才能逐步实现。

此外,40 年来的史学理论界还就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历史的叙事问题、后现代主义史学问题、历史虚无主义问题、全球史观问题等展开过研究、讨论。近日,部分学者还就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阐释学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总之,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课题越来越广泛,研究的深度越来越加强,有些问题的研究涉及到国际史学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在史学领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四、反思 40 年史学理论发展的几个问题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学科的发展,成绩重大、有目共睹。我们在总结这一学科的发展成就时,也想就学科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进行一些思考,以期为今后的学科发展提供参考。

(一) 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

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理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绩巨大。但是,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作为广义的历史科学理论中是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的。如探讨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的问题,应该说既属于历史理论的课题也属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课题,两者是不宜分开的。许多历史理论的课题,本身也是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中提升上来的。要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理论问题,就离不开对中国古代的史学著作的研究。同时,许多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需要从事史学理论的学者来参与,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学者,不应该把历史理论的问题看作自己研究对象之外的问题,否则就会从总体上削弱历史科学的理论研究。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对历史理论问题的关注显得不足,这种状况是不利于史学整体的发展的。因此,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也应该更多地关注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提高理论问题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力。

(二) 史学理论和史学实践

^① 瞿林东《关于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② 乔治忠《用中国话语发展当代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5月12日。

改革开放以前,史学理论没有成为一个学科,也没有专门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但史学理论的研讨十分热烈。之所以如此,因为当时参加讨论的学者都没有离开史学研究的实践。比如,参加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中国古代农民战争问题、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问题、土地所有制等问题讨论的学者都是同时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者;参加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学者都是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正因为这些学者直接从事史学研究的实践,所以在理论问题的研究上才有发言权。特别是老一辈的史学家,他们在专业历史问题的研究上很有成就,史学理论的素养也很高,所以才能造成那种史学理论研究的热潮。但是,近年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的学者,对实际历史问题研究缺少功底,他们专注于自己的领域,在历史问题上自然也就没有发言权。

史学理论的研究应该与史学发展的现实密切联系,脱离历史学发展的实际,形成抽象的纯史学理论对当代史学的发展是不利的。《史学理论研究》的副主编刘军研究员曾呼唤“史学理论研究要‘接地气’”,他认为“史学理论是史学现实的发展,是从史学问题中来,又回到史学中去的理论。史学是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无论研究哪个领域都有现实的影子。但近些年,有些史学理论研究表现出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从外国到外国、脱离史学实际、脱离中国问题的倾向。”他主张:“要振兴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既要回归经典文本,更要面向现实,面向当代史学研究,面向当代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①

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理论发展,对史学实践的关注得不够还表现在轻视史学评论的现象上。40年来,许多学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撰写了许多优秀的学术著作,也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上提出了很多远见卓识,这些应该是新时期史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成果,但学术界对此总结研究得很不够。学术刊物上,史学评论的文章篇幅较少,许多书评只是限于宣传和介绍,高水平的学术评论比较少见。对于史学理论学术研讨会的综述也是一般的报道情况,缺乏对焦点问题的深入揭示与评论,使得学术研讨会的影响力也日益萎缩。

(三) 史学理论和史学史

自从20世纪90年代国家公布历史专业学科目录以来,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专业,改变了过去两个学科之间过问较少的局面,对于专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积极效应。对于史学理论来说,与史学史专业的结合使它的学科发展找到了深厚的基础。没有史学史的基础,史学理论就成为空中楼阁。对于史学史来说,通过与史学理论的结合能够提升史学史研究的理论性,改变过去那种史学要籍介绍和评述的老模式。这种结合,大大地提高了史学史研究的学术水平。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结合,在老一辈史学家来说是不成问题的,他们既可以从事史学史问题的研究,也可以自如地上升到史学理论层次的研究。对于新进入这个领域的学者来说,在史学史研究中找到栖身之地就不再关注更广泛的史学理论问题。这样,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的队伍虽然在不断扩大,但是对于史学理论问题的探讨来说,却往往会感到后继无人。

(四) 中国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理论

史学理论学科40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建立中国自己的、具有民族特点的史学理论体系一直是史学理论工作者努力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史学理论工作者也从西方的史学理论中吸取、借鉴了大量有益的新学理,丰富了中国史学理论的内容,中国史学理论工作者对当代世界史学理论问题的研讨,也接触到国外史学理论的前沿问题,扩大了我国史学理论在国际史坛的影响,提高了史学理论研究的整体水平。今后,中国史学理论和西方史学理论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然而中国史学理论学科的发展,除了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优秀遗产外,也不应脱离国际史学理论发展的大背景,不能放弃对西方史学新学理、新方法的吸收和借鉴,不放弃与国

^① 刘军《史学理论研究要“接地气”》,《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3期。

外史学理论界的交流对话。这样,才能有利于中国史学理论整体的学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40 年来,中国史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无论从学科体系的建设、学术体系的健全、学术探讨的深入、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上都显示出巨大的成绩。这些成绩是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取得的,也为新形势下的中国史学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史学理论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值得所有从事史学理论教学、研究的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在总结与反思 40 年史学理论发展的基础上,为促进史学理论学科和整个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新的努力。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Theory in China in the Four Decade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Zou Zhaochen

[Abstract] One of the major changes in historical research caused by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s historical theory becoming an independent subject. So, without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re's no Chinese study of historical theory. In the past 40 years, successes have been achie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and the influence of historical theory on historical research spread constantly. However, we should rethink th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theory more in depth, and this is a prerequisite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

[Key words]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four decades historical theory

(责任编辑 汪高鑫)

读者·作者·编者

编辑部收到各地寄来的许多优秀稿件,对各位作者的大力支持我们表示深深的感谢。为了做好编发工作,有些事项需要作出说明。

一、我们特别欢迎原创性、有真知灼见的学术文章。

二、请作者注意我们刊物的性质。有的来稿虽然很好,但由于与本刊性质不符,这些稿件也难以采用。

三、本刊一律用脚注,即注文在每页之下。

四、来稿务必附上中、英文摘要、作者单位、职称、研究方向、邮编及联系地址、电话号码。刊物实行匿名审稿制,有关作者的情况介绍,请另纸书写。

五、来稿作者为两人以上者,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说明,以便核实、确定为合作的作品。

六、来稿务必核对引文出处,包括作者、论著名称、出版社、出版年、页码等。

七、编辑部要求作者加工、修改而发出的函件,请作者按照要求修订、润饰。但此函件不是采用通知。谢谢作者的配合。